



# 2026年1-2月

# 师德学习教育活动指南

党委教师工作部/人力资源部

2026年1月

## 目 录

## 第一部分 理论学习

## 第二部分 榜样引领

张晋藩：为祖国而努力，以育才为乐事 · · · · · 8

## 第一部分 理论学习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健全学校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提升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成效，学校已于2025年11月28日印发《关于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北理工办发〔2025〕56号）。

党委教师工作部已于2025年12月将文件纸质版发放至各单位。该文件为2026年1-2月理论学习资料，请各单位认真学习。

温馨提示：文件为学校“内部”文件，请各单位以传阅、重点节选或口头传播等方式做好学习宣贯。不得拍照、不得在网络上传播。

## 第二部分 榜样引领

(摘自教育部网站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专题——  
“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

### 高铭暄：铭鼎法坛 暄煦杏林

在中国法律界，提起高铭暄，几乎无人不晓。作为当代著名法学家、新中国刑法学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高铭暄与很多“第一”直接相关：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

还有一个“第一”，标定了他在杏坛的成就——第一批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的“人民教育家”。

“培养学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和成就。”躬耕三尺教坛70余载，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铭暄无比珍视教师这一神圣职业。他用一生践行着火热的誓言——“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

1928年，高铭暄出生在浙江玉环一个三面环山、南临东海的小渔村——鲜叠村。父亲、叔叔和大哥都从事法律工作，受家庭熏陶，高铭暄从小就对法律工作心怀向往。

1947年，高铭暄考入浙江大学，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求学。攻读研究生时，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并

在两年后以全优的成绩留校任教。

1954年，刚留校一年的高铭暄被学校选派，参与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这一年，高铭暄26岁，是起草小组中最年轻的一员。

历经25年、前后38稿，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那一刻，坐在人民大会堂里的高铭暄热泪盈眶。他看了看手表：16时05分。“这是让我铭记一生的时刻！从此，新中国结束了没有刑法典的历史！”

此后数十年间，无论是修订后的刑法出台，还是对刑法修正案的反复讨论，高铭暄都参与其中。

在参与立法的同时，高铭暄始终没有离开过三尺讲坛。

师者高铭暄，有着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1984年，高铭暄成为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并在此后几十年间培养了60多名刑法学博士。

他教过本科生，培养过研究生，指导过博士后研究人员，还为进修生、电大生、夜大生、高级法官班学员、高级检察官班学员授课，培育了众多法学教授、法学家、法官、检察官……

“可以说，高老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长王轶说。

高铭暄指导学生，秉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同时注重因材施教，尊重每个学生的特点、个性和

兴趣。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是高铭暄心中理想的师生关系。在他的学生中，学术观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者并不鲜见，但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同学生们分析这些不同的观点。

“如果说得有道理，我是尊重各类学术观点的。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学术需要辩论，真理越辩越明。”在高铭暄看来，学术发展离不开创新，学生应当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一味追随老师的观点。

师者高铭暄，有着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精益求精讲好每一堂课，是他作为教师的“职业良心”。

“爸爸在教学一线工作了几十年，对教材内容其实早就烂熟于心了。但他还是会为了讲好一堂课而精心准备，备课到凌晨也是常事。哪怕是相同的内容讲给不同的人听，他也坚持重新整理讲义。”高铭暄的儿子高晓东回忆。

在高铭暄看来，这样做再正常不过：“听众不同，认知角度就不同，因而讲稿需要重新整理，语言表述也一定要适合受众特点。我要尽己所能上好每一堂课，让学生获得最大收益，不能浪费学生的青春。”

高铭暄的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军告诉记者，几十年来，高老师的刑法学课程始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高老师上课严谨、考虑周全，听得出，他的教案是一字一句推敲得来的。”冯军感慨。

冯军留校任教后，高铭暄不放心这个“新手教师”，经常耳提面命，将自己几十年的讲课经验倾囊相授：“给本科生讲课要注重打基础，不要讲太前沿的内容，基本概念一定要清楚，有争议的问题先不要讲；给研究生讲课可以讲有争议的内容，也可以讲前沿问题，但是要把正面和反面的意见都讲明白讲透彻；给博士生讲课要讲最前沿的内容，启发他们自己思考……”

即使再忙，高铭暄每年都会抽出数月时间专门审阅学生的论文。他说：“无论带着什么目的来读书，只要当我的学生，就决不允许以混文凭的态度虚度光阴。”

师者高铭暄，有着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

在刑法教学领域，高铭暄首倡“综述研究法”，即在教学中指定某个问题让学生全面收集中外资料，形成文献综述并提出见解。在他看来，“这一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拓宽其视野，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思考，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明确学术方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就是这一方法的受益者。他回忆道：“正是通过‘综述研究法’，我进入了刑法学研究的大门，这也成为我刑法学术的起点。”

如今，97岁高龄的高铭暄仍然笔耕不辍，关心关注刑法学领域的科研进展。

“作为教师，要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要敏锐把握新一轮科技革

命发展趋势，产出引领性的学术成果，并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到人才培养中；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学术能力、创新思维，为培养造就一大批世界顶尖的战略人才、领军人才，为培养出学术大师提供有力支撑。”他深情地说。

2015年4月，因在刑法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高铭暄荣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该奖项素有“刑法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高铭暄也成为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

“要把中国刑法学搞上去，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高铭暄念兹在兹，斗志不减，“只要我们的国家富强，有影响力、有吸引力，刑法学就会做大做强。”

年幼时，高铭暄曾在对京剧颇有心得的父亲指点下，学唱京剧名家片段。《洪洋洞》里杨六郎唱的那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高铭暄唱得极好，也做得极好……

70多年前站在天安门西南侧翘首观看开国大典的北大学子，如今已是鲐背之年。而他的眼中依然闪烁着炽热的光芒：“我热爱教育工作。只要身体能坚持，我还会继续做下去……”（本报记者 张亚雄 姚晓丹）



# 张晋藩：为祖国而努力，以育才为乐事

又是一个金秋时节。每到此时，张晋藩的记忆总会“溯源而上”，越过岁月的千山万水，来到75年前的那个9月…

…

1950年9月1日，刚满20岁的张晋藩坐在教室里等待分配专业。得知组织上要调他去读“国家与法权通史”研究生，他“心里很是高兴”。他还记得，开学那天，刘少奇同志在典礼上告诉同学们：国家困难的时候，你们在这里学习，国家情况好转的时候，你们要出去工作……所以，诸君一定要努力。

从此，“为祖国努力”成了张晋藩一生的追求。75年时光流转，今天，荣获“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晋藩，端坐在自己一手创立的蓟门法史书苑会客厅里，身后陈列的，是记录古代法典的一部部古籍、一根根竹简，那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法律足迹。张晋藩，正是这足迹的守望者，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

从教70余年，张晋藩为中国法制史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丰富了其学术内涵，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他以确凿史料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诸法并存，民刑有分”，打破了西方学者“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偏见，也修正了中国学术界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不承认中国固有民

法的认识。

早已著作等身的张晋藩做到了“开一方风气之先”，但他最珍视的，还是“老师”这个称谓。他招收培养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1984年，张晋藩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他的学生朱勇的博士学位证书上，赫然印着“001”号。

今天，张晋藩仍然坚守在教学一线，亲自带博士生。每年9月，他都会给学院的博士生上大课。70多年教学生涯，内容早已熟极而流，但是他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讲师张京凯告诉记者，先生仍会自暑假就开始备课。“先生的每一节课都会形成一篇严谨的讲义，通过重要概念串联起资料和历史脉络，既生动又有说服力。先生自中年后，深受眼睛黄斑病变的困扰，近年来尤甚，只能通过6倍镜甚至12倍镜工作。但是高倍镜下，工作十分钟以上就会头晕不止，因此先生课上不能板书，他会把重要概念口述给学生，并请学生做成PPT在课上边播边讲。每次讲课，慕名前来‘蹭课’的学生都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院长顾元1999年考入张晋藩门下。20多年间，“先生耳提面命，春风化雨”，让顾元获益良多。

顾元告诉记者，在学校里，张老师的学生“最好认”，因为“带有张老师学术传承的印记”。

“先生常说，法律史学的研究不能一味钻故纸堆，为历史而历史，不能做成‘书斋里的学问’，而应放眼天下，沟通历史与现实，挖掘并阐释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精髓。”顾元介绍，“先生治学特别强调创新，主张‘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他对学科的卓越贡献，就是在不间断的创新开拓中完成的。我们这些学生也谨记先生教诲，以创新为目标，‘文章不写一句空’，不拾人牙慧，希望能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些贡献。”

张京凯仍然记得先生指导自己第一次讲课的情景。哪怕对材料掌握得很充分，他仍然无法做到“像先生那样游刃有余，说是讲一个小时，总能正好在一小时处收尾，恰到好处”。先生让他把内容写成讲义，对着镜子练习，“一遍不行两遍”，“讲课不能只靠临场发挥，要讲的内容，必须尽在掌握”。

这样的字斟句酌，是“张门弟子”的必修课。张京凯说，成为先生的博士生之后，每学期总有一段时间十分紧张，那是交论文的日子。“由于眼疾，先生无法长时间伏案修改，但是他有自己的方法——每到交作业的时候，他就让两名博士生到家里，挨个读论文给他听。读到关键处，他会让学生停下来反复读。碰到有的学生论文没写好，遣词造句粗糙，他会提醒学生——要认真、严谨，要建立规范科学的学术思维。然后便逐字逐句反复斟酌，帮其修改。曾有一位学生，论文总是达不到要求，先生就让他像高中生一样每周去家里

汇报。他的论文涉及中外比较，中文部分先生逐句修改，外语部分先生求教别的老师，直到改得满意为止。先生带学生，像是古代师带徒一样，手把手教学，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景良最感慨的是，先生培养学生，首重其德，而后将“诚、信、智、勤”结合起来。“先生曾引用学者熊十力的话说，‘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绝不肯求真知’。在他心里，治史是庄严的事，史料的钩沉辨伪尤不可偷懒、自欺、敷衍塞责”。

“不偷懒、不自满”，这是张晋藩的人生格言。“做学问的人对学问了解越多，学习时间越长，就越感觉自己学识浅薄。如果再给我这么长的时间，我能看多少典籍、简牍啊！我把这些希望都寄托在我的学生身上。”张晋藩满怀情感地对记者说。

回首求学生涯，张晋藩还记得两位授业恩师对自己的影响：“一位是我初中时的老师。少年时，喜欢华而不实的辞藻，一次写游记，我写出两句类似‘临风涕零’的骈句，自己得意非常。发作业的时候却发现，我只得了70分。老师说，少年人要有昂扬向上的生气，不可沉溺萎靡，否则即使文章辞藻优美也无意义。还有一位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法学家何思敬先生，他既是革命家又是法学家，他告诫我，做学问不能讲条件。在延安时，他翻译《哥达纲领批判》，一盏油灯如豆，在灯下他聚精会神，生怕有错漏，结果完成得

很好。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他再次翻译《哥达纲领批判》，明亮的灯光下，却把‘金钱铁律’误写成了‘金钱铜律’。可见做学问只与‘认真’二字相关，并不因条件好而有所改变。”

70余年来，张晋藩不忘老师的教导，追随心目中“大先生”的足迹前行。采访中，他欣慰地说：“我迄今培养的100余名博士生，他们或在学术上成为带头人，或在实际工作部门担任要职，无不尽职尽责为党工作，未闻有玩忽职守者。

”

桃李芳菲，这是他送给国家的“礼物”，是一位人民教师最大的骄傲！（本报记者 姚晓丹）

